

别雷小说《彼得堡》末世论思想解析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5918>

刘涛

文学博士，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liutao@shisu.edu.cn

摘要：作为俄国象征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别雷受到弗·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发展出独特的末世论思想。别雷的末世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文论《俄罗斯诗歌中的启示录》和长篇小说《彼得堡》中。小说故事时空“1905年的彼得堡”以及主要人物身上都有着浓重的末世论内涵。末世论思想贯穿了别雷一生的创作，这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关键词：别雷，《彼得堡》，末世论，启示录

AN ANALYSIS OF THE ESCHATOLOGY THOUGHT OF BELAY'S NOVEL PETERSBURG

Liu Ta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nnota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Symbolism, Andrey Belay developed a unique eschatology thou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V. Soloviev. Belay's eschatology is mainly embodied in his literary theory *Revelation in Russian Poetry* and his novel *Petersburg*.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novel "Petersburg in 1905" and the main characters have a strong eschatological connotation. The eschatology thought runs through Belay's creation all his life,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Belay, Petersburg, eschatology, apocalypse

作为俄国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别雷受到弗·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别雷在1900年春天，在弗·索洛维约夫去世前不久跟哲学家见面，并且出席了《敌基督的故事》的朗读会。别雷从弗·索洛维约夫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索菲亚思想，还有对世界末日的期待。他认为基督再临已在眼前，更新世界的大雷雨就要在20世纪初年实现。这个预期的落空并没有动摇别雷的启示录信念，末世论思想在他的文论和创作中拥有重要地位。

别雷的末世论思想在论文《俄罗斯诗歌中的启示录》中得到详细的阐发。在论文中别雷把整一的世界比作沉睡的美人（спящая красавица），而当美人醒来，与她敌对的就是“红龙”（красный дракон）。这里的意象显然是取自《圣经·启示录》中“身披日头的妇人”和“红龙”。妇人和红龙的对立和斗争成了别雷象征世界的总体背景，而且这是一个充满着启示录意味的末世图景。别雷受到索洛维约夫“论世界历史的终结”讲座的影响，跟随着索洛维约夫认识到“身披日头的妇人”（Жена, облеченная в солнце）这一异象的重要意义，心中已经浮现出对人类未来的恐慌预感，认为“人类开始走上了唯一的道路。未来宗教的雏形已经出现，已经能感到永恒女性的气息。”（Белый. А. 408）别雷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未来的小人”（грядущий хам）形象中为自己找到了佐证，并且认同于后者提出的压抑人类的“世界的疯狂”（мировое безумие）的概念。安德列耶夫的“红笑”

(красный смех)也充满着末世论意味：“一切都淹没于火海之中。幽灵将发出笑声。他的‘红笑’将焚尽宇宙。对于瞎眼的人们，世界末日充满了惊恐，因为世界末日不过是惊恐的世界‘红笑’。”(Белый. А. 410)从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德列耶夫三位同时代文化名人身上，别雷确认了对世界末日的恐慌并非自己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时代精神。他认为，在世界的现实表象下面隐藏着一场无形无声的斗争。这场无声的斗争会逐渐演变为涤荡世界的惊雷。

别雷的末世论思想同样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小说《彼得堡》里有着极其鲜明的图示。

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别雷的代表作，使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彼得堡》具有象征性、意识流、音乐性等艺术特征，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而我们这里把研究焦点对准小说的思想主旨。小说的思想主旨是什么？我们要从小说时空和人物的末世论思想内涵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

一、小说时空的末世论内涵

小说的时空，即时间和空间背景，是1905年的彼得堡。这个时空有何象征含义？对于“彼得堡”这个象征概念，译者在译后记里就明白地指出：“尽管小说里彼得堡是作为故事地点而存在的，而且对城市的河流、运河、岛屿、桥梁、公园和纵横交错的大街、马路都说得十分明确、具体，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它又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俄罗斯帝国乃至包括东方和西方即整个世界的象征。”(安·别雷 685)。

在别雷观念中，俄罗斯帝国是个“地理上的统一体”，无限的俄罗斯帝国无限地等同于全世界。而彼得堡在俄罗斯帝国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与其他的俄罗斯城市有着“惊人的区别”。“不管怎么，不仅我们感到，而且在地图上存在着——彼得堡：形似一个套一个的两个圆圈中心的一个小黑点；它就从这个没有度量的精确小点有力地宣告自己的存在：从那里，从这个小点，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印好了的书籍；从这个神秘的小点，飞速传出一道道通令。”(安·别雷 9)对于彼得堡来说，涅瓦大街又具有特殊意义：“涅瓦大街——在当时俄国一个非首都的城市里——非同一般。”“涅瓦大街就是彼得堡大街”，它还是“一条欧洲大街”。(安·别雷 8)

彼得堡还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作为彼得堡创建者的彼得大帝的形象时时在小说中闪现，青铜骑士成了一个噩梦的开始。彼得大帝和青铜骑士是彼得堡噩梦的开始，而如今即将到来的是噩梦的结束：“彼得堡，彼得堡！在漫雾的包围中，你还在追踪我那无聊的大脑游戏：你——冷酷无情的折磨者；你——不安静的幽灵；你往往使我想到年岁；我在你那可怕的大街上奔跑，并跑到从陆地的边缘处开始的那座铁桥上，以便通往无边的远方；在涅瓦河那边，在另一个世界的绿色的远方——重建岛屿和房子的幻影，抱着空虚的、以为那边就是现实的希望，因为它——是个没有号哭的广阔天地，不把惨白的烟云驱散到彼得堡的马路上。”显然，噩梦结束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的开始，“没有号哭的广阔天地”已经点明了这个世界的基督教文化原型。

在小说另一处，则对青铜骑士的末世论意义作出了充分阐发：

“彼得堡则将一片荒芜。

“这些日子里，地面上所有的人都将抛开自己的地方；将大吵大闹——世界上不曾有过的大吵大闹；大批黄皮肤的亚洲人将离开久居之地，把欧洲原野变成血的海洋；将会有，将会有——对马岛！将出现——一个新的卡尔卡……

“库利科沃之战，我等待着你！”

“这一天，新的太阳将普照我家乡的土地。太阳啊，如果你不升起，那么，啊，太阳，欧洲的海岸将被沉重的蒙古黑斑所覆盖，这些岸上将到处漂浮泡沫；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灵将重新沉入海底——沉入早已被遗忘了的发源地的混沌之中……

“啊，出来吧，太阳！”(安·别雷 152—154)

显然，在日俄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别雷受到索洛维约夫《敌基督的故事》的影响，把来自亚洲人的“黄祸”看作是俄罗斯、欧洲毁灭的根本原因。青铜骑士、彼得堡都是具有末世论内涵的象征形象。别雷对“新的太阳”的呼唤，则可以理解为是对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呼唤，别雷希望通过文化革新来拯救世界。

总之，彼得堡是俄罗斯的象征，是世界的象征，而在小说中，作为俄罗斯和世界象征的彼得堡正走向毁灭。因此，可以说，“彼得堡”的象征内涵就是濒临毁灭的俄罗斯，濒临毁灭的世界（欧洲文明）。

“190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解读它要联系小说中的相关描述。小说中的1905年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人会说，在梯比利斯，警察发现了一个制造炸弹的工厂，在敖德萨一个图书馆给封闭了，以及在俄国有数十所大学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集会，——而且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没有人会说，正是在这个时候，数千名坚定的崩得分子来到了群众集会上，彼尔姆的工人固执己见，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哥萨克包围的雷瓦尔铸铁厂的工人们举出了自己的红旗……莫斯科至喀山的铁路已经开始罢工；人们已经砸破火车站的玻璃，涌进车站的仓库，使库尔斯克、温达沃、尼日戈罗德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停止运行；数万节车厢，像被吓呆了似的停在各个空地上；交通——中断了。观看着这走过的许多圆顶礼帽，没有人会说，彼得堡出大事了，几乎所有的印刷厂排字工人都选出了代表，聚成一堆堆的；也进行罢工的——有涅瓦造船厂，亚历山大机械厂及其它的工厂；彼得堡市郊有很多满洲大皮帽挤来挤去的……如果把耳朵贴到地面上，就会听到谁的亲切的悄悄声；一种来自手枪射击的啪啪声产生出的悄悄声——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柯尔希达，以及从利巴瓦到勃拉戈维申斯克传来。”（安·别雷 424）

这些事件，并非别雷的主观臆造，而是在1905年俄国发生的史实。整个是一片混乱啊。而最后提到的贯穿俄罗斯国土的“手枪射击声”则预示着一场血与火的革命即将到来，这场革命将摧毁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因此，“1905年”就是俄罗斯，乃至世界面临的危机时刻。当下是《启示录》中的混乱，前方是不可避免的覆灭，最后出现的会是新天新地。

如果考虑到小说创作和发表的年份（1911年开始写作，1913—1914年出版），那么“1905年的彼得堡”这一象征对应的真实时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和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

“1905年的彼得堡”蕴含的是别雷对于即将到来的一战和十月革命的预言。别雷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时代气息，并把这种预感编码为“1905年代彼得堡”。这一象征向世人预言了俄国和欧洲旧秩序的必将崩溃，以及新天新地的必将到来。

二、小说人物的末世论内涵

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也都打上了着末世论思想的印记。下面我们对三个主要人物（儿子、父亲、革命者）进行具体分析。

儿子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红色的多米诺”，代表着颠覆旧世界的毁灭性力量。对于儿子尼古拉的“红色的多米诺”形象，父亲阿波罗是这么看的：“红色当然是毁灭俄罗斯的混乱的标志；但是，他不愿意承认多米诺要恐吓他的荒唐愿望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安·别雷 255）小说中出现的“忧伤而瘦长”、“穿白色多米诺斗篷”的形象则是耶稣基督的象征，他与“穿红色多米诺式斗篷”的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以及象征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相对立，代表着拯救的力量。但他在小说中只是浮光一现，只是发出淡淡的哀叹，没有发挥任何实际作用。

儿子尼古拉刺杀父亲的意图，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与当时的革命恐怖活动相联系（社会革命党1904年成功暗杀了内务大臣普列维，1911年暗杀了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也可以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角度来阐释，如小说中提到尼古拉对小时候绰号“父亲的孬种”的屈辱性认识（安·别雷

533)，但在小说中，它主要是被上升到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层面来解读的。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从自己家族的蒙古血统来得出自己担负的“自古以来蒙古人的事业”：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回想起来了：他——一个古老的图兰人——以及转世了许许多多多次；现在则转世成一个俄罗斯帝国世袭贵族的骨肉，以便完成一个自古以来隐秘的目的：动摇全部基础；在腐败的阿里安人血液中，应当燃起一条古老的龙，并用熊熊的火焰把一切吞吃掉；古老的东方让无形的炸弹的碎片遍布我们的时代。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一枚古老的图兰炸弹——发现了故乡后，现在正在猛烈地爆炸开来。”（安·别雷 376）

在与父亲的梦幻对话中，父亲阿波罗指出：“你想要炸死我；因此，一切都在毁灭……鸟儿，野兽，人们，历史，世界——一切都在毁灭：倒塌在土星上……”（安·别雷 379）由这段话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整部小说线索的刺杀图谋并非是简单的情节元素或吸引读者的写作技巧，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着隐晦的末世论意味在内。而在炸弹爆炸前的精神混乱时刻，尼古拉要阅读的正是预言世界末日和新天新地的《启示录》。如译者所指出：“它所揭示的极度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也成了既是俄国的又是全世界的，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家里一声巨响突发的灾难，同时象征着一种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安·别雷 689）

父亲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他是“国家机体中的最终一级”，是“告密、请求和电报的最终一级”（安·别雷 74），但他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最终一级是关在自己身上的中心——意识。”这个意识不是他个人的意志和个性，而是国家机器的集体意志。他在机关里依靠着国家机器的集体意志来管理居民们，而当他走出机关的围墙，他自己就成了那个被管理的居民：“走出冰冷的墙围，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突然成了个居民。只有从这里，他腾升而起，并疯狂地在俄罗斯上空翱翔，招得仇人给他起了个要命的比喻（比作蝙蝠）。这些仇人——毫无例外——全是居民；在墙围外边，他也是自己的这样一个仇人。”（安·别雷 75）别雷以此表明，对阿波罗的个人暗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如小说中反复提到的维·普列维被暗杀一样，他死后国家意志就会转移到另一个代表者身上。阿波罗思考时政的时候，心中只有绝望和冷漠。他代表着维护旧世界的保守势力，他最后的退休象征着这些保守势力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杜德金——他是新约启示录的爱好者，混乱力量的代表。他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受到一种“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就是“一种对死亡的共同渴望”，他“怀着欢呼、欣悦和害怕的心情，为它陶醉”（安·别雷 140）。

小说里说他重复着普希金笔下《青铜骑士》主人公叶甫盖尼的命运：“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甫盖尼，这时才头一次明白，他白白跑了一百年，轰隆响的撞击毫无任何愤怒地跟随着他——在农村、城市，在大门口，在楼梯上；他——一个永远受恳求的人，而所有过去的及迎面过来的人加在一起——只不过是些痛苦的过往幽灵，直到阿尔罕格尔的喇叭。”（安·别雷 493）这里的“阿尔罕格尔的喇叭”正是他所阅读的《启示录》中预告基督再临的号角。而基督再临之后就是善恶大战、最后的审判和新天新地。

而在杜德金的意识中，将要发生的是：“到时候，一切都将翻过来；在粉碎石块的金属撞击下，利潘琴科将粉身碎骨，顶层亭子间将倒塌，彼得堡也将毁灭；在金属的撞击下，女柱像将毁灭；连阿勃列乌霍夫的秃脑袋也将因为对利潘琴科的撞击而分成两半拉。”（P493）

在三者的关系上，别雷把他们比作希腊神话里的宙斯和雅典娜：“在一定意义上，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像宙斯：带一个包裹的陌生人——帕拉斯刚从他脑袋里诞生出来，从那里同时爬出另一个也是这样的帕拉斯。参议员的家便是这个帕拉斯。”（安·别雷 50）可以说，旧世界的秩序维护者从自己身上衍生出自己的敌对力量。阿勃列乌霍夫家族的古老纹章又是一个象征，被独角兽顶住的骑士喻示着绝境中的苦斗。尼古拉觉得父亲就是那个被独角兽顶住的骑士，同时他自己也被顶住了。这个顶住父子俩的东西无疑就是导向末日的混乱世界。

别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发展的三元矢形路径：世界旧秩序——混乱——新天新地。三个主要人物活动的空间是从世界旧秩序向新天新地的过渡阶段——混乱。

其他人物身上也有末世论思想的折射，例如与杜德金同样是“轻率的政党”成员的斯捷普卡，他是个破落的小店主的儿子，他与一位年轻老爷的对话，堪称是对《启示录》的现代解读。老爷给斯捷普卡读了一封流亡国外的政治流放犯的来信，信里写道：

“伟大的时代临近了：到末日开始不超过十年了。请记住、写下并转告后代：一九五四年比任何年代都重要。这将关系到俄罗斯，因为在俄罗斯有着费拉德尔菲亚教堂的摇篮；我们的耶稣基督曾亲自为这座教堂祝福。”斯捷普卡还要跟老爷私下谈谈关于“基督二次降世”的事情。（安·别雷 160—161）这俩人的对话表明，别雷赋予 1912—1913 年以特殊的历史意义，把这两年与末世联系起来。

结 语

别雷的末世论思想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是我们研究别雷思想和创作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别雷末世论思想的成因与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诗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暴风骤雨、改天换地的时代。期间最重大的两个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都具有着摧毁旧世界的颠覆性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捣毁了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文明秩序，十月革命则在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对于生活于这个如火如荼的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不仅在现实世界中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沧桑巨变，而且在精神生活中经历了信念的破灭和世界观的重造。无论是为维护旧世界而负隅顽抗，还是为建设新世界而高歌猛进，这个时代的人们所期待的都是“末世的救赎”。正如高尔基在《海燕》中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布宁等文学家都对这个大动荡时代有着极为敏锐的嗅觉，而生活于其中的诗人作家们，如别雷、勃洛克、安德烈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都在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中透露出浓重的末世论气息。由此可以说，别雷正是时代之子。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Бельй.А. Апокалипсис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книге Символизм: как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2. 安·别雷：《彼得堡》，靳戈，杨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